

城市化 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

忻平 主编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化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忻平 主编.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 - 7 - 5495 - 0852 - 5

I. ①城… II. ①忻… III. ①城市化—研究—上海市—近代 ②城市—社会生活—研究—上海市—近代 IV. ①F299.29
②D69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6062 号

出 品 人: 刘广汉

责任编辑: 刘冬雪

装帧设计: 赵 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 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 - 31260822 - 129/139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 276017)

开本: 690mm × 960mm 1/16

印张: 23.25 字数: 330 千字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城市化与都市管理

江浙军阀战争与上海特别市的发端	3
现代教育:20—30 年代上海人社会化的主渠道	10
城市人口结构对 30 年代上海娱乐业的社会影响	16
1931 年江淮大水义赈募捐机制及其特点研究 ——以上海为中心的考察	31
介绍、服务与职业培训 ——国民党社会部上海职业介绍所简述	46
1949 年新中国建立前后上海对旧人员的接收与安置	52
论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对社会异质性的消解 ——透过上海游民改造的分析	64
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自然生态环境问题探析	77

第二章 社会群体与社会阶层

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近代社团组织	83
20 世纪前期上海中产阶级的发展模式与群体特征	90
1927—1937 年上海律师业发展论析	98
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力车夫群体研究 ——以 20 世纪 20—30 年代为中心	106
1929 年上海中医界反对废止中医案的抗争	117

第三章 旅沪群体与移民社会

小刀会起义与上海近代移民趋势变化·····	123
从国家让渡到民间介入	
——同乡组织与近代上海外来人口管理·····	132
旅沪宁波移民自然构成、社会构成分析·····	142
转化与传承：四明公所与宁波旅沪同乡会的比较考察·····	152
城市近代化中的上海闽商·····	159
近代上海福建人群体结构与特点·····	173
近代旅沪徽商的“乡土之链”	
——徽宁会馆述论·····	186
“身有所寄，心有所托”	
——战后上海待遣日侨的集中管理·····	199

第四章 企业发展与经济生活

技术引进和企业发展	
——抗战前章华毛绒纺织公司的个案研究·····	219
试论近代上海民营企业的对外技术选择·····	227
1926—1931 年上海缫丝业劳资关系述评·····	236
试论 1920、1930 年代上海童工问题·····	241
旅沪宁波帮企业家的营销韬略·····	253
抗战前上海民族企业市场营销策略的心理学分析	
——天厨味精厂案例研究·····	262
中国企业史蕴涵的经济文化精华·····	270

第五章 社会生活与文化记忆

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城市文化地图解读	
——城市娱乐区布局模式及其特点初探	277
声音传播的社会生活	
——1927 年至 1937 年的上海广播演变轨迹	289
上海都市民俗特征初探	297
近代民俗变革的动力考察	
——以上海为个案	305
都市变革中的上海方言	313
民国时期上海的集团结婚	
——一种政府行为的考察	320
开历史先河的上海女子体育运动对社会风气的影响	332
清末民初中国民众西医观念的演变与发展	
——以上海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336
30 年代上海中医界团体精神之建立	345
后记	351

序

忻 平

—

本书以城市化和城市生活命名,实际指涉的是城市社会生活史这样一个主题。毫无疑问,城市社会生活史并非刚好发生在城市的社会生活史而已。城市不是个可有可无的历史背景,相反,城市为历史主体提供了一个活动空间。这个空间是地理和社会意义上的;是既定的,又是开放的,与历史主体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城市社会生活史,就是研究城市空间中的社会生活及其互动。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概念,笔者将其拆分成社会史、社会生活史与城市社会生活史三个关键词,分层加以表述。

先从社会史谈起。社会史的出现,无论从研究范围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是对传统史学的一种突破。相比传统史学对政治史和历史事件的偏重,社会史更关注社会结构及其变迁。在中国大陆三十年来的史学实践中,对“社会史”这一概念出现过不同的理解和表述:一是“专史说”。认为社会史是一门与经济史、政治史并列的历史学分支。这其实是狭义的社会史,认为社会史应主要研究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以及社会结构变迁中普通人的经历。二是“通史说”。这是广义的社会史,其“社会”并不把政治、经济、文化之类的社会因素排除在外,以人的社会生活的历史演变过程和规律为基本内容,再现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三是“范式说”。它把社会史理解为一种史学研究范式,寻求和建立一种历史研究的社会视角和维度。^①诚然,无论哪种看法,都强调对“社会”的关注,相对于以往以帝王将相唱主角的历史叙事,它更多地关注到普通和日常的因素。这种目光

^① 赵世瑜:《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下移的研究方法无论如何都大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和视野。

再来谈社会生活史。社会生活无疑是社会的一个重要表征。在一些情况下,“社会生活”被当作“社会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①;在另一些情况下,社会生活又受到“新文化史”的青睐。但同时“社会生活史”概念也经常被提及。从国内学界三十年来的史学实践来看,社会生活史作为社会史的一个研究对象,多用于古代史和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研究。其研究范围不一而定,具体内容千差万别,由此可见社会生活史概念的外延之广。实际上同社会史一样,社会生活史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生活史,既包括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史,又包含人类整体社会发展变迁过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结构演变与变革;而狭义的社会生活史则仅指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行为及其演变。广义的社会生活史与狭义的社会史几近重合;而即使取其狭义,也是纷繁芜杂,包罗万象。

笔者认为,社会生活史主要是研究人们的社会生活,通过这种研究了解一地、一个群体、一个社会阶层的人们的生活方式,达到对人们总体社会生活的特点和规律的把握。在方法论上,主要是通过微观、中观、宏观结合细微末节与宏大叙事相融,通过一朵朵美丽的历史浪花,透视历史汪洋大海中的深沉主流和涌浪,达到把握主体和大趋势的目的。

接着谈城市社会生活史。城市社会生活史可以视为城市史和社会生活史的交集,但不能理解为简单的重合。城市史是中国近年来方兴未艾的一个史学分支。二十余年来已在城市起源、特征与分类方面有成熟的研究,从秦汉至明清,从单体城市到类型城市再到区域城市都有相当一批成果,其中江南市镇和口岸城市如上海、武汉和天津等是研究的重点。^②总的来看,过去的研究总体上具有一定的结构主义倾向,多强调社会经济与结构,城市社会生活看似琐碎的诸多细节往往难以纳入其叙事框架。故而城市史对人的研究相对不足,并且重群体而轻个人,多共性而少个性。当前的研究已经注意到了人的生活方式和风尚习俗的变化及其趋势,但较多关注的是经济发展变化的单向影响,对民众的主体选择与生活中细微末节变化显示出的未来变化趋势还应作更深入研究。当然,历史研究总是要受史料的制约。最能反映普通人的普通生活的史料,由于太过司空见惯,往往无人记载,结果许多时候日常生活的历史都处于失忆状态。因此特别

① 梁景和:《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河北学刊》2009年第3期。

② 熊月之、张生:《中国城市史研究综述(1986—2006)》,《史林》2008年第1期。

需要学界去“动手动脚找东西”。

城市社会生活史,就是特定的人在城市这个特定的空间的活动的历史。沙漠里没有人力车夫,特定的空间塑造特定的活动。当然,如前所述,空间不是一成不变,它与人的互动显而易见。这个现象可以借用平常所说的“城市化”概念来解释。城市化既是城市本身的从小到大、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化过程,也是城市人从“乡民”到“市民”的角色转换过程。城市创造了城市人,城市人也缔造了城市。就在两者并行发展的轨道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的新型社会生活方式——城市社会生活。

职是之故,本书的上海史研究特围绕城市化与社会生活的主题展开。

二

本书是团队创作的结晶。作者群体中既有长年从事上海史研究的学者,也有初出茅庐的新生代学人。尽管他们学术背景不一,学术功底各异,但都对城市史研究,特别是城市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积极的探索与实践。本书所汇集的题目,有些是老题新做,有些是新拓展的原创性领域——如战后上海日侨的撤离等。城市史的研究既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又有迫切的现实需要。同时,城市史的研究既需要深度与广度的提升,也需要理论与视角的创新。我们正是带着这样的思考,完成了本书的创作。至于是否实现了初衷,还有待读者评说和实践检验。本书由以下几部分构成:

一、城市化与都市管理。近代上海的城市化的飞速发展是由多种因素铸就的,从上海特别市建立到建国后对上海城市的整合,城市管理问题成为城市良性发展的必然需要。其间,现代教育这一社会工具在实现上海人的社会化方面起到了独特作用,培养了具有新型人格的都市人,促进了上海城市化的更好更快的发展。同时,自然生态环境问题则从另一个视角阐述了城市化进程中的不和谐的一面。

近代上海的城市管理呈现出从“自治”逐渐被纳入“官治”的轨迹。如上海职业介绍所,这一国民政府主导的社会机构在拓宽市民就业渠道、缓解失业压力方面进行了种种尝试,体现了政府参与社会治理的努力。作为近代上海城市化进程的延续,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加大了对上海城市管理的力度,对老上海城市管理格局进行了“破”与“立”的双向改造,如对游民群体的管理和改造,使其获得新的生活方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生的上海市政府完成了对旧社会的

“清扫”,从而为上海进一步的城市化与都市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城市管理逐渐被纳入政府宏观控制的同时,民间力量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作用。1931年江淮发生严重水灾,在政府力量严重不足的背景下,民间力量借助于各种媒介,广泛倡导市民参与帮助江淮灾民完成灾后重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二、社会群体与社会阶层。城市人是城市的活动主体,他们的生活状态、社会认同与身份建构等,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民国时期上海的中产阶级,包括职员阶层与知识阶层两个群体,具有新老中产阶级并存、传统性与现代性共处的特征,作为社会的“稳定器”,他们的人格发展及阶层属性对于社会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律师群体作为社会地位较高、社会认可程度较高的阶层,既是近代中国走向法制化的产物,也是个人发展空间的体现。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力车夫群体,作为中国乡村凋敝与城市崛起的共同产物,反映了城市在现代社会高速发展背景下,进入城市的“乡民”的边缘化谋生状态。民国时期的中医阶层作为传统知识阶层和文化的代表,面临着政府与社会的巨大挑战,为维护尊严与自我价值而进行竭力的抗争。

社团及其代表的各个社会阶层与群体,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但政府主导型的社会整合仍居城市管理主导地位,体现了“国家在场”与“官民合治”随着时代变迁各有消长的都市管理特点。

三、旅沪群体与移民社会。上海是座移民城市,因为移民来自不同地域、从事不同行业、有着不同的背景和经历,形成了不同的群体,造就了上海移民社会的色彩斑斓。最初,上海移民以福建和广东人为主,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则演变为以江浙两省人为主。清政府对小刀会起义的残酷镇压,是改变上海移民来源地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上海新型经济发展的代表之一,旅沪宁波移民是一个典型,他们的自然属性及社会属性,均体现出近代上海移民的转化与传承是组织变迁与社会变迁相互激荡的结果。旅沪福建人还体现出了乡土观念强等群体特征。旅沪徽商是旅沪传统商帮的一个典型,他们的“乡土之链”——徽宁会馆对内、对外两个方面有着不同的社会功能,强化了徽商的群体意识,并对上海城市发展有所助益。此外,在“三国四方”的近代上海还生活着数以万计的外国人,如在沪生活半个多世纪的日本侨民,在即将离沪返国的特殊时期,中国军方协同上海市政府,通过官治与自治相结合的方式,对这批待遣日侨进行了人性化的集中管理。

从以上个案不难看出,上海移民的管理特点是国家权力让渡给民间的同乡

组织,后者在近代上海外来人口管理中发挥了社会控制、冲突协调和利益维护的作用,有助于近代上海城市化进程的良性运行。

四、企业发展与经济生活。消费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的体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市民的消费观发生了从生存本能向个性解放与自我价值体现的质的飞跃,实现了所谓的“消费革命”。消费的需求,催发技术革新的加速。20世纪,上海的民营企业已经有能力对技术引进做出理性选择,其引进项目从单一走向多元,引进方式也从间接变为直接。技术和人才的引进推动了章华毛纺织公司等上海民营企业的发展。在上海经济生活中,劳资关系和劳资纠纷一度十分引人瞩目,二三十年代,政府的政策避免了大规模的工人暴动,但无法避免大量的罢工活动,上海的缫丝业即是其中的典型。值得注意的是,劳资双方的关系不仅仅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斗争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恰恰体现为有形无形中对契约度的把握,和斗争一样,妥协也成为一种常态。童工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而广受关注,二三十年代上海的童工问题给当时的上海社会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甚至影响了上海现代化的进程。近代上海的高速发展有着童工的血泪。近代上海企业非常重视营销,在营销方面的进取和创新为中国经济的进步作出贡献;同时,从天厨味精厂的个案可以看出,上海民族企业在营销时已经在有意识地迎合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形式多样的经济行为体现着经济文化,经济文化是长期经济行为积淀下来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近代中国企业的艰苦创业精神和“中国式管理”,是值得我们重新发掘和发现的历史资源。

五、社会生活与文化记忆。近代上海城市社会生活过程中的风俗与文化变迁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20世纪30年代是上海城市娱乐业的黄金时期,此时上海城市娱乐区空间分布是有特征和规律可循的。同时期的上海广播先后出现中国化、上海化和国家化三次改流。近代上海民俗可以归结出中西交汇、南北兼容和新旧杂陈三个特征。近代上海民俗变革的动力来自于稳定转型期社会秩序、城市经济发展和现代文明进步三个方面。民国时期上海的集团婚姻,实际上也是一个“变俗”的案例。上海市政府依托行政力量,从政府举办走向政府管理,突出了政府行为对民风民俗的介入和影响。东方型政府对风尚习俗的高度重视以及对移风易俗的引导,成为现代政府一种必备的职能。在社会急剧变迁中,上海方言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异,无论从语言整合、构成,抑或语言的地位和包容性等,都反映了当时上海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生活变迁。开历史先河的上海女子体育运动改变了上海人的健美的观念,影响了上海人的生活方式乃至社会风尚。西医对中医的冲击反映了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上海人接受西医的

过程不但是一个医学史上的事实,更是一个心理和文化的历程,对西医的接受也伴随着对中医的贬斥,致使民国时期中医面临遭废止的危机。上海中医界建立了职业团体精神和群体认同,以助其共渡难关,这也可视为一个文化现象。

上海在近代中国的地位十分重要,与此相应,学界关于上海的研究也是硕果累累,甚而形成了一门“上海学”。^① 即使具体到上海城市生活史这一主题,也已经有丛书问世。^② 本书的作者们近水楼台,有幸加入上海史研究队伍,并初步形成一个研究团队。通过向广大同仁的学习借鉴,本团队方得以参与讨论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并在今天以专著的形式付梓。至于本书的纰缪之处,还有赖于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最后,谨向本书的作者们表示感谢;编辑团队在组稿、编排、校对的过程中也付出辛勤劳动,特此一并致谢。

① 参见熊月之、周武主编:《海外上海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② 即上海社科院熊月之教授主持的《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共计划推出28卷。

第 一 章

城市化与都市管理

江浙军阀战争与上海特别市的发端

李国林^{*}

一、辛亥革命后上海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

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开始以超常的速度发展,人口在1900年超过100万,1915年超过200万,成为中国第一大、远东第二大城市,相较于中国其他地区,上海作为特殊区域的特征已经显现。^①而在行政隶属关系上,晚清上海只是淞江府属的一个县,清政府设江南提督于淞江。这种行政建制与其经济地位极不相符。

上海有全国最大的租界,其统治者可以通过租界加强与列强的联系,获取政治资本,求得仕途发达。辛亥革命后,各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发展工商业的政策,上海的工业分布和行业规模均有长足的发展,经济中心地位进一步确立,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上海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形成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但进入军阀混战时期,其发展之路却是畸形的。

北洋时期,上海除正常贸易之外,尤以鸦片进出口的收入为各系军阀所垂涎。自上海开埠以来,鸦片始终是最重要的进口洋货,据海关报告,至1911年,鸦片输入还占上海进口物总值的11%。由于各界人士的反对和国际禁烟大会的压力,公开合法的鸦片进口逐年减少,至1917年3月3日,根据国际协定完全停止,但是非法的私下鸦片交易始终存在,且越做越大。“非法的鸦片贸易早在1916年就同合法的买卖势均力敌,现在它有了自己的地盘,当然规模就做

^{*} 李国林,上海立信会计学院文法学院副教授,博士。原文发表于《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① 张仲礼:《关于中国民族资本在20年代的发展问题》,《社会科学》1983年第10期。

得更大。”^①除了进口鸦片之外,国内各地所出产的鸦片烟如红土、川土、云土、西土、湘土等也源源不断运来上海,基本由各地军阀用军舰贩运,交淞沪护军使派兵士看守,然后用军用卡车运到十六铺与法租界交界处,交给黄金荣、杜月笙等帮会人物转销,淞沪护军使从中获取巨大的利润。据当事者回忆,卢永祥、何丰林每年此项收入将近百万^②,仅由印度运进上海的鸦片税收就足够养三个师^③。

上海还给驻扎在上海的各路军阀带来巨额商业税收。单南市、闸北两市每年的税收就有 100 万元以上。孙传芳联军司令部月开支达 201.46 万元。孙仍要求“原来有市政的地方,旧税要积极整顿。旧税以外,还要筹办捐税。原来没有市政的地方,要照闸北、南市的办法,一律纳税”,故在过去经常收入的田赋、货物税、杂税等之外,又增加三种税:一是淞沪宅地税,二是货物增税,三是土布税(由半税增为全税)^④,又为孙传芳筹得了大笔款项。此外,还有上海的兵工厂和军火生产贸易所带来的收入,这些有利因素势必导致上海成为那些视军队如生命的各方军阀的财政支柱,为争夺此地不惜兵戎相见。

二、各路军阀对上海的争夺及影响

辛亥革命后,上海的政权机构“府”制取消,设立沪军都督府,与江苏都督府并存。袁世凯上台后撤去沪军都督府,设上海镇守使和淞江镇守使,各派军阀便开始了争夺上海控制权的斗争。1915 年,上海和淞江两个镇守使署合并,改称淞沪护军使,由杨善德任护军使,卢永祥为淞沪护军副使,镇守吴淞。袁死后,北洋军阀分为直、皖两派,双方产生争斗。1917 年,北洋政府命杨善德任浙江省督军,卢永祥升任淞沪护军使。杨、卢都亲近皖系,而江苏为直系冯国璋的势力范围,冯以副总统兼江苏督军。皖系极力向江苏渗透,直系决不答应。1917 年,冯国璋入京就任大总统,段祺瑞有意让卢永祥以帮办身份坐升江苏督军。冯坚持以直系的江西督军李纯调任。1919 年杨善德病死任上,卢永祥升浙江督军,淞沪护军使一职由卢的部下何丰林继任。直系则在卢永祥升任浙江督军之后,即

① 徐雪筠:《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86 页。

② 钟士澄:《齐卢战争的幕后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 18 辑。

③ 马葆珩:《齐卢之战记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35 辑。

④ 《时报》,1926 年 6 月 11 日。

以齐燮元任“帮办江苏军务”，不久，齐即升任会办江苏军务，李纯死后齐又坐升江苏督军。这样，江苏为直系所控，浙江为皖系所控，而介于两者之间的上海，由于护军使为卢永祥嫡系，因而实际上便为皖系控制。上海的民政长官名义上归江苏任命，但事实上作为上海护军使的何丰林对于上海的一切无不加以干预，双方围绕对上海的控制权展开激烈的斗争。

由于江、浙分属直、皖等不同的军阀派系，江浙之间的形势不能不受到皖、直、奉等军阀之间既相倚又相争的影响和制约。（见下表）

北京政府、浙江省、江苏省首脑更迭对上海的影响^①

北京政府	任职时间	江浙关系	浙江	上海	江苏
黎元洪	1916. 6—1917. 7	紧张	吕公望	杨善德(皖)	冯国璋(直)
冯国璋	1917. 7—1918. 10	紧张	杨善德(皖)	卢永祥(皖)	李纯(直)
淞 江	1918. 10	紧张	杨善德	卢永祥	李纯
徐世昌	1919	紧张	卢永祥	何丰林(皖)	李纯
徐世昌	1920	紧张	卢永祥	何丰林	李纯
徐世昌	1921	紧张	卢永祥	何丰林	齐燮元(直)
徐世昌	1922	紧张	卢永祥	何丰林	齐燮元
黎元洪	1922. 6—1923. 6	紧张	卢永祥	何丰林	齐燮元
曹 錕	1923. 10—1924. 11	战争	卢永祥	何丰林	齐燮元
段祺瑞	1924. 11	战争	孙传芳(直)	宫邦铎(直)	卢永祥
	1925	战争	卢湘亭(直)	宫邦铎	杨宇霆(奉)
	1926	和平	陈仪(真)	孙传芳	孙传芳
张作霖	1927	和平 (北伐除外)	陈仪	孙传芳	孙传芳

虽然直系屡次想用武力夺回上海，却不敢轻举妄动。1924 年，孙传芳控制福建，江西迅速投靠直系，形势发生转变。1924 年 8 月齐卢之战爆发，上海因卢的战败落入直系手中，而东北奉系也时刻窥视着上海。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战败，奉系把势力伸向上海，1924 年 12 月 11 日，北京政府罢免齐燮元江苏督军职，任命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奉系张宗昌于 1925 年率军南下，打败齐燮元，上海被

^① [美]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29 页。

奉系控制。同年10月,孙传芳再次进军上海,奉军退出,一直到北伐军进驻上海,孙传芳逃离,北洋军阀对上海的争夺才告结束。

战争使上海的经济受到严重打击。金融市场因人心浮动而发生恐慌,公债狂跌,洋厘暴涨,银根奇紧,钱庄倒闭。随后,棉花棉纱价格暴跌,布匹交易完全停止,物品交易所被迫关门。战火切断沪杭、沪宁铁路后,市面进一步恶化。商业呆滞,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江浙两省二十多万难民涌入租界。^①据当时人估计,一系列战争所造成的各种损失达4亿元以上。^②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灾难,同时,战争也完全打破了商界的发财计划,从而引起了各界的不满,他们认为,在上海设护军使、驻兵、办兵工厂是招致军阀争夺上海、酿成兵祸的主要原因。因此,上海各界纷纷行动起来,用各种方式要求北京政府裁撤护军使、不驻军,军工厂改为民用工厂,并谋求上海的独立。

三、江浙军阀混战与上海地区各股力量谋求独立发展的努力

早在清末,地方自治的构想在上海就已露端倪。1900年,上海革职在籍的地方士绅李钟珏就已开始研究如何“仿行文明各国地方自治之制”,以图自强。1903年11月,上海城乡内外总工程师局正式成立,由上海等县地方士绅自筹款项,施行修桥、筑路、疏浚浜河等公共事业(据《上海自治志·工程成绩表》统计),拥有市政建设权、民政管理权、公用事业管理权、社会治安权和地方税收权。总工程师局设有议事、参事两会。议事会由议董32人组成,内举一人为议长,议长任期两年,议董任期四年,但每两年必须抽签改选50%。参事会由领袖总董、办事总董、各区区长及各科科长共13人组成(见《上海市自治志·董事会职员表》)。1909年7月,总工程师局改为城市自治公所,有关上海地区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的一切活动,都已由其负责办理,已初具城市自治的行政规模。1911年11月3日上海光复,自治公所改组为市政厅,在国家政权更迭动荡的北洋政府时期,由于城市自身的不断发展,上海的城市自治运动从未间断,各种社团组织在城市生活中作用巨大。

江浙战争一触即发,更促使上海各界立即采取行动,通过国家立法或北洋政府首肯,把上海建成独立建制的行政区划,摆脱战争的威胁。战前,上海的工商

① 《时报》,1924年10月1日。

② 《时报》,1924年11月1日。